

#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加速问题及其本质<sup>\*</sup>

## ——兼评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高红明<sup>\*\*</sup>

**摘要:**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

**关键词:**人工智能 劳动解放 社会加速 新异化

技术社会形态的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恩格斯(2012:999)晚年曾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造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2017:295-298)在《未来简史》中也指出:“到了21世纪,现代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一旦如此,个人主义即将崩溃,权威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sup> 高红明,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也将从个人转向由算法构成的网络。”人工智能作为目前人类社会的前沿技术,是致力于模拟、替代和延伸人类智能的颠覆性技术,既是科技革命,也是社会伦理实验。它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以大数据的使用和各种复杂的算法规则为基础来呈现人类智能,既引发社会结构变化,增加人类福祉,带来人类社会进步,也可能迫使人屈从于由人制造的智能机器,即获得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控制和安排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从而引发技术、道德和社会风险等新问题。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人工智能时代蕴含的解放和新的奴役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至关重要又适逢其时。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主要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入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该理论认为,科技加速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开端或动力源头,推动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后两者的加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科技加速发展。社会在这种循环中呈现出一幅动态稳定的图景,使得人们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对立样态:一方面,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机器等人工智能高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使得人们在相同时空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实现人—机器—物之间的高度联结,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机器并被紧密地捆绑在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人们与过往的时间、空间、物、行动、自我和社会不断疏离和异化(罗萨,2018:7-8)。

##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加速发展效应

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类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马克思(2012a:172)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其中,劳动资料不仅包括劳动主体、劳动对象,还包括劳动主体得以改造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提升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象征,如铁器的发明为人类社会从原始时期低水平、欠发达且不稳定的渔猎社会向较为

发达和稳定的农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可能,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使用等都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核心动力。邓小平(1994:87)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这段话后来被更加简练地概括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其颠覆性不仅体现在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还对加速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2018:24)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做出预言:人类正面临一次量子跃进,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人工智能时代也许是自然人类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而且这个时代不到百年行将结束。

一是人工智能加速知识和产业的革新。与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主要依靠资本和机器相比,人工智能时代或信息社会是以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为核心的高科技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科技之上,以信息或知识为主要生产资料,通过信息或知识的创新、共享、传播和创造性使用,大幅提高了知识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孙伟平,2010)。在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01:20-21)看来:“在新的信息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源于生产知识、信息处理和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或信息无疑是这个时代生产和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知识的创新提升技术的应用和应用技术的改革又促进知识的生产之间产生一种良性循环。”这种以信息或知识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人工智能时代或信息社会,显现出与工业革命时代截然不同的后工业特征。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97:14)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与工业社会以机器的电气化使用为动力不同,后工业社会则主要以信息和知识的智能化应用为驱动,其中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源泉。”后工业不仅加快新兴科技的研发速度,缩短知识更新周期,而且使得现代产业呈现出与传统产业截然不同的特征:不仅出现智能化生产方式(无人工厂),而且依托人工智能、数字平台等现代新兴行业,其发展和更新势头迅猛。例如,Tiktok自2017年上线后不久就成为席卷世界、用户数亿的社交平台,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是一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而迅速发家的科技公司,而不少“网红”产业又依托Tiktok平台萌芽并迅速崛起。

二是人工智能加速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加速知识的更新和产业的升级,而且还系统地改变了世界,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成素梅,2020)。法国技术哲学和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技术文明和日益标准化的文化对人类未来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影响。他指出:“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任何社会、人类或精神事实比技术事实更为重要,它如此深刻地重塑了人和世界。”(Ellul, 1964:3)实际上,埃吕尔的这一观点是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来的,他所阐述的“技术事实”主要指以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为核心的三次技术革命不断塑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成素梅,2020)。那时,人类的生活和交往方式更多地依靠单一或单向线路的电话、电报等,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国际网络(互联网)还未出现,民用手机也未产生。而在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以互联网、大数据各种复杂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以智能机器为中介的人与万物的互联,使得当代的人们进入了独立而又彼此连接的虚拟世界;流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知晓天下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深刻体现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和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影响——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传统的、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转向虚拟的、即时的线上交流;人工智能机器人配送等无接触式的买卖行为;等等。概言之,人工智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重新界定了空间并极大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从而加速了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革。

三是人工智能加速文化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重塑。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涉及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系统的科学和工程,它的发展呈现出学科一体化趋势。这种一体化的趋势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文化环境,而且参与并加速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天恩,2004)。2017 年 4 月 27 日,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北京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做了正反两方面的阐述:一方面,近年来人工智能里程碑式地发展并广泛参与和改变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人工智能的成功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发展可能招致文明甚至人类的灭亡。霍金对人工智能持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并非首创,也必定不是绝唱:只要人工智能及其在实践领域仍然处在探索阶段,这种对前沿科技的假想或过度

想象就不会消失。但毋庸置疑的是,人工智能有着改变人类的巨大潜力,或预示着人类文明新的嬗变(胡明艳、白英慧,2021)。这种嬗变,首先体现在人类不同语言之间的神秘感被祛除,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技术支撑;其次体现在人的思维的可视化或物化,即借助智能机器人等设备,人的思维和意识过程可以被捕捉和呈现出来;再次还体现在社会治理方面,即国家和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等)对社会进行治理,民众也通过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参与政治问题的谈论、权力的监督等。

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一书中揭示了一个被人们普遍感知但又常常无力从整体上去把握的社会问题——社会加速。他敏锐地从诸多社会加速现象中梳理出其逻辑演化线索,洞察到科技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开端,并引起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等社会整体性加速发展的现实。罗萨(2018:39)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物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科技(通常意指像蒸汽机、汽车、电报、计算机等新科技)加速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等的全面改变。”但罗萨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分析社会加速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并深入挖掘社会加速背后的动力及机制:一方面,整体的社会加速发展趋势使人们普遍对生活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异化现象(时间、空间、物、行动和自我等异化)呈现出来,但这些新异化的产生本质上仍然根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另一方面,社会加速也不尽然都是负面的,在科技加速基础上产生的时空萎缩效应,使得人们在相同时空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生存体验。此外,科技加速发展在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条件下,尽管不必然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但在加速产业升级过程中客观改变了劳动的内涵和形式,为解放劳动奠定客观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 二、人工智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

人工智能得以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动力引擎,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通常采用两种手段:或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剩余价值,或通过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在人权日益受到关注和保护的背景下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弥补和取代人

力且大幅提高生产率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其必然性,但客观上为另一种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即尽管它可能挑战人的劳动权利,但同时也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何云峰,2017)。换言之,随着从特殊的工具性领域向通用的自主性领域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人类创造的“劳动者”,其劳动意义产生着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效应(王天恩,2004)。

首先,人工智能体在繁重、枯燥的工作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中解放出来。恩格斯(2009:432-433)在描述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指出:“工人强烈憎恨上等资产阶级是一种证明,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非人的境地,证明他们不想被人贬低为牲口,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主观上是资本市场竞争主体的自利行为,即为了规避过度使用人力劳动可能引发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而积极研发和采用取代人力的人工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技术,从而增加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但它客观上加速了生产智能化和产业结构进程,使得一些原本由人力劳动来完成的笨重的、脏乱的、机械重复的以及有毒有害的、危险环境下的等对劳动者身心带来极大伤害的工作被智能机器人取代,进而为劳动者从非人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客观条件。例如,农业生产中使用智能控制的无人飞机、货运码头上使用的自动卸货机等,都将人从这些动物式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建立在以往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使得生产在机械化基础上进一步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工人客观上摆脱了对机器的依附和附庸地位,即从动物式、非人的被动地位被迫解放出来。

其次,人工智能强化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性,使人从“无思想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将劳动者从动物式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劳动本身的解放;相反,这些劳动者在人工智能体日益崛起并不断向人工劳动领域渗透的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劳动问题,即在与人类创造出来的、旨在替换和取代人类劳动的人工智能的竞争,人类劳动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不被取代,不被沦为“无用的存在”。可以说,人工智能不仅将快速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而且将更快地取代非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王天恩,2004)。2016 年,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 先后以 5:0 和 4:1 击败欧洲围棋冠军樊麾和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引发人们

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的广泛关注和忧虑,因为它将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智能的家族相似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暴露出来,即在那些笨重的、机械的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之后,学习并创造性地应用知识成为人和人工智能未来竞争的主要方向和阵地。在传统观念中,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工作岗位,并日益缩减人的劳动领域,对人类而言的确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系统 and 整体思维层次出发,这种取代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换言之,在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表现是创造新的知识,那些非创造性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中得以解放出来。

最后,通用型人工智能体的广泛应用,使人可能从“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经济,通过将劳动力商品化而使劳动异化,即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劳动者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并为后者生产不属于自己的商品。正如马克思(2012b:165)在批判分工异化基础上指出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2012b:165-166)进一步指出消灭这种异化的两个前提:一是这种异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这些人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并且认为这两个前提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社会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其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还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改变了社会的劳动分工,即人工智能技术从作为少数公司、少数行业专用的特殊工具向具有社会效应的通用型工具的发展,使得以往用以界定劳动分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劳动剥削和异化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换言之,由于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专用人工智能在生产中排挤了人力劳动,因而在这一生产环节上就不存在劳动异化问题。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深化并在各个行业的普及,社会劳动分工的问题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即从以往作为劳动分化、劳动物化进而劳动异化的根源,转变为人工智能的系列布局,人类就能从具体、细化的事务性分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最符合人作为思想性存在的创造性的知识或信息活动,早期剥削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异化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很可能被人工智能扬弃(王天恩,2004)。

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和条

件,但推动人工智能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增殖和竞争逻辑,因而其发展和应用本质上是达到资本家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获取比人类劳动更多更快的回报,资本家将毫不犹豫地应用这种技术,但这种应用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广泛使用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有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罗萨在他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做了详细阐述,并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环节:首先,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本身,是由现代社会的时间短缺所驱动的,而之所以会出现时间短缺的问题,是由资本增殖和竞争逻辑决定的,即在资本主义时代,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而利用创新来暂时领先于其他竞争者,则是获得额外收益的必要手段(罗萨,2018:30-31);其次,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而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类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罗萨,2018:33);最后,这种以竞争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加速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力量,它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主体的意志和行动施加了影响力,二是所有主体都受其影响而无可挣脱,三是它无所不在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四是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反抗它(罗萨,2018:83-84)。换言之,人工智能与资本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资本竞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发展离不开资本的驱动;另一方面,在资本增殖和竞争逻辑的驱动下,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又存在对生活的殖民化或集权趋势,使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成为被动的、异化的存在。

### 三、人工智能引发新的异化问题

人工智能作为资本增殖和竞争逻辑的必然产物,在为资本家谋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获得了高速发展和广泛使用。在不存在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将会像生命力顽强的爬山虎一样,在它能够取代人力的地方肆无忌惮地蔓延,渗透到各个技术部门和社会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并推动社会加速发展。正如克劳斯·德勒等(Dörre, Lessenich & Rose, 2015:146)在《社会学、资本主义和批判》一书中指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永恒动力是基于利益追逐的‘加速’”,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社



会生活、工作、学习、爱情和休闲等社会各领域都在加速。罗萨(2018:84)甚至明确指出:“社会加速在资本竞争和宗教文化应许的情况下已经变成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这种力量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施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换言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构成了对人或公开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孙伟平,2020)。

第一,人工智能正在入侵社会和生活各个领域。不论是工业领域中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还是智能家居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手机和智能平台上无形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它们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科技领域革命,也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蓝江,2019)。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正日益向生活(衣食住行)、消费、学习、工作甚至思维等各个方面渗透,这种渗透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使得生活智能化,这种智能化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即改变了以往生活作为陌生他者(the Other)的形象,使得生活成为人类思维和智能的一种反映,如智能手机、智能电器、自动驾驶汽车、智能语音识别技术、自动人脸识别技术等的使用,使得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环节变得像人脑的思维过程一样可控或可量化,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够根据不同交通工具的使用精确地计算出一段距离所花费的时间;二是人工智能使得生活高度整合,即通过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同面向的生活得以被整合到同一平台,如智能手机同时为人们提供和实现消费、学习、工作、社交和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和需求;三是人工智能使得生活更加简单和机械,人工智能整合生活的同时也使得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这种简化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将原本复杂的、费事的工作简单化为某个按钮的操作、某个指令的发布等;四是人工智能使得人们对人工智能体日益依赖,这种依赖既有现实方面的因素如中国普遍实施的无纸化支付方式使得人们不得不依赖智能支付,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如因过度使用手机或某个应用程序而产生的依赖心理等。

第二,人工智能的整体性产生新的集权主义。以往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及成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的影响有限,技术的运行机制及道德伦理效应基本上都在人的控制之中,因而所谓的技术“价值中立”获得了广泛认同。然而,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异质性和高度整合性使得技术的价值中立发生了革命性

变化(孙伟平,2020)。海德格尔(Heidegger, 1977:12)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一书中指出:“技术不再是‘中性’的手段,而是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赫拉利(2017:351)在《未来简史》中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对人们产生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普遍具有约束力的控制,执政者甚至对这种控制往往也是后知后觉和无计可施的。罗萨甚至直接将这种无处不在的控制视为某种新的集权主义,即它对人们的意志和行动施加了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可挣脱、普遍存在且人们几乎无法反抗的。和赫拉利一样,罗萨(2018:83-84)也认为这种新的集权主义并非政治上的,即认为这种具有专制性质的社会状态更多地出自政治上所谓高度民主自由的西方社会,因为政治独裁政府并无法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换言之,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整体的和普遍的,即人工智能以它无所不在的形式渗透向各生活领域,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其影响甚至控制。

第三,人工智能的集权主义产生新的异化问题。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和大数据各种复杂的算法实现了人—机器—物的互联,从而实现了对人和社会集权主义式的控制,但这种控制是以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为前提的,它极大地方便和简化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极大地改变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得人与世界之间的直接关系变成以第三方即人工智能体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变成洪堡大学哲学系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拉埃尔·耶基(Jaeggi, 2004:18)所谓的“缺乏关系的关系”(Die 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状态,这种状态在她看来就是一种“异化”状态。耶基在《异化: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性》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当今异化的内涵及表现。在她看来,异化意味着“冷漠”(Indifferenz)与“分裂”(Entzweiung)、无权与无关系,且对所经历的世界而言是一个无关紧要和陌生的存在。异化的主体会与自身相异化,其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动的、被未知力量摆布的客体(Jaeggi, 2019:1)。罗萨认同耶基对现代世界的判断,即现代技术加速发展推动的社会整体加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种集权主义倾向的世界,就是一种异化的世界,人与世界是一种异化的关系或缺乏关系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异化在现代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空间异化,表现为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人的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

之间的日趋脱节；二是“物界”(Dingwelt)异化,表现为我们生产的和我们消费的物日渐变得陌生,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日益不相容；三是行动异化,表现为社会的加速发展使我们来不及去了解和把握我们的行为、行为得以发展和作用的对象与结果,它成为外在于我们行为的东西；四是时间异化,表现为时间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流逝；五是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表现为在加速发展和不断异化的空间、物界、行动和时间中,我们无法获得自我和身份认同的可靠素材(罗萨,2018:118-142)。

通过反思和追问为何生活不美好的问题,罗萨从理论自觉和现实关切两方面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病症,即科技加速所引发的社会整体加速,并导致新的集权主义和异化的产生。这种异化的社会根源是资本增殖和竞争逻辑,而异化的世界关系使得人们彼此处于冷漠和疏离的状态,甚至自我都处于一种无所归属的异化状态。可以说,罗萨的社会加速及新异化理论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生命主体及其生存困境的深刻关切,实现了异化理论的当代转型,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提供了当代新版本(苗翠翠,2020)。然而,当罗萨(2018:149)试图解决社会加速在现代社会引发的新异化问题,即基于异化的世界关系进一步回应何谓美好生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时,他的方案却因高度抽象和形式化而陷入空洞,因为他是从异化的概念而不是产生概念的现实出发的:他首先认同耶基对异化的界定,即它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关系;其次从这种异化的对立面开出拯救这个冷漠的世界的药方,即重建或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建立彼此的共鸣关系或共鸣体验——共鸣意味着与异化不同的世界关系;最后,正如罗萨自己承认的,他所谓的“共鸣”“共鸣轴”并不是对异化的消除,而是与新的异化同为世界的统一体,他所要做的也不是消除异化(他认为异化是无法消除的),而是尽可能创建更多的共鸣机制以减轻异化对人的破坏性作用。

结局是否如罗萨所陈述的那样,我们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作用无能为力呢?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正确的研究态度似乎要进一步从问题背后的现实进行研究,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不仅局限于当下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智能社会的形态。

## 四、结语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但这种解放不会随着智能科技的不断改进而自动实现;相反,人工智能就其产生和快速发展的动力而言仍然是资本竞争的产物,而资本的增殖和盈利需要使得资本家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往往是功利性的、盲目的和狭隘的。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使得他们一方面不会去深入探究人工智能的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无暇研究和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当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控制及由此带来的新异化时,不仅罗萨从个体情感和抽象理论角度给出的共鸣式救赎式方案,没有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异化世界背后的真正现实原因,即资本的盈利本性,而且他对社会加速的批判也没有引向对资本逻辑本身的批判,而只是将其作为社会加速发展的三个环节,资本逻辑的主要机制则被具有宗教意味的文化动力所取代,因而该方案的结果必然流于形式和陷入空洞(孙亮,2016)。

事实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是涉及人类整体命运与前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全局性问题,因而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社会变革。正如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会随着智能科技的进步、技术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自动实现,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迅猛增加而自动到来(孙伟平,2021)。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应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应该按照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原理展开系统性的社会变革。

## 参考文献

- 贝尔,丹尼尔,199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成素梅,2020,《智能革命与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 邓小平,1994,《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09,《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12,《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何云峰,2017,《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探索与争鸣》第10期。
- 赫拉利,尤瓦尔,2017,《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胡明艳、白英慧,2021,《人工智能预示人类文明的全新善变》,《社会科学报》9月16日,第6版。
- 卡斯特尔,曼纽尔,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蓝江,2019,《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
- 罗萨,哈特穆特,2018,《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2012a,《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2012b,《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苗翠翠,2020,《当代社会的异化新形态——罗萨“社会加速逻辑批判”论析》,《国外理论动态》第4期。
- 孙亮,2016,《资本逻辑视域中的“速度”概念——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考察》,《哲学动态》第12期。
- 孙伟平,2010,《信息社会及其基本特征》,《哲学动态》第9期。
- 孙伟平,2020,《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孙伟平,2021,《智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 托夫勒,阿尔文,2018,《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王天恩,2004,《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 Dörre, K., Stephan Lessenich & Hartmut Rose 2015, *Sociology, Capitalism, Critique*, London: Verso.
- 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ohn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 Jaeggi, R. 2004, *Entfremdung: 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Begriff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 Jaeggi, R. 2019, *Entfremdung: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Mit einem neuen Nachwort*, Frankfurt: Suhrkamp.